

当恩典被核算：教会建制中的“核算滑移”与基督身体的生成性危机

本文试图命名并穿透教会制度化进程中一个持续发生却未被充分言说的张力：恩典的不可核算性，与教会作为人际组织必然追求可核算性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结构性矛盾。本文论证，“核算滑移”并非一个有待纠正的管理偏差，而是这一矛盾在教会认知评价层面持续结出的霜——教会用以识别和尊荣其成员之奉献的注意力重心，会在建制运作中不可遏止地从对不可量化之生命承重的惊叹，滑向对可量化之事工产出的核算。文章首先以华人城市教会的建制化实践与教会增长运动为标本，追踪这一滑移在制度与叙事层面的动力机制，并通过一个具体执事会讨论的“慢镜头”展示该机制如何在善意敬虔的决策现场中实况运转。

作者 葡萄 · 约 2.5 万字 · 发表于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本文试图命名并穿透教会制度化进程中一个持续发生却未被充分言说的张力：恩典的不可核算性，与教会作为人际组织必然追求可核算性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结构性矛盾。本文论证，“核算滑移”并非一个有待纠正的管理偏差，而是这一矛盾在教会认知评价层面持续结出的霜——教会用以识别和尊荣其成员之奉献的注意力重心，会在建制运作中不可遏止地从对不可量化之生命承重的惊叹，滑向对可量化之事工产出的核算。文章首先以华人城市教会的建制化实践与教会增长运动为标本，追踪这一滑移在制度与叙事层面的动力机制，并通过一个具体执事会讨论的“慢镜头”展示该机制如何在善意敬虔的决策现场中实况运转。随后，本文提供两个跨越数十年时间的信徒生命历程的深度描摹，不是作为概念的被动注脚，而是作为概念从中被逼出的活骨。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核算滑移”与韦伯的理性化、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格林利夫的仆人领袖以及约德尔的另类共同体论述进行严格对勘，通过“竞争性诊断”与“代理变量”的双重论证，确立其不可替代的辨别面。继而在十字架神学的垂直审判下，指出恩典事件作为对一切核算逻辑的彻底中断，构成对教会内部认知窄化的终极质问。结论转向实践，探讨在承认核算逻辑不可完全祛除的前提下，教会如何可能性地建立“对抗性仪式”——不是要根除滑移，而是要在每一次仪式化的反向动作中，让恩典逻辑重新获得对核算逻辑的发言权，并诚实地面对这一仪式自身被重新俘获的危险。本文的证伪条件明确：如果在那些有意识地、以非工具化方式去“看见”和“承接”不可核算之生命承重的教会中，这些恩典行动在被如此对待之后，反而系统地、可重复地因被“尊荣化”或“标签化”而消散或变质，则本文的核心判断即告失效。

关键词：教会论；核算滑移；恩典；理性化；十字架神学；建制批判；发生学

一、导论：一个持续发生的矛盾，与它在认知层面结出的霜

基督教群体在谈论共同体的建造时，一个反复出现、以至近乎本能的关切是：谁在真正地付出？我们如何找到他们、确认他们，并将他们树立为榜样，好激励整个群体一同迈向成熟？这份关切并非错谬——使徒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正是对一种健康的、彼此辨认的群体生活的根本呼唤。然而，在真实的地方教会生活经验里，一轮又一轮围绕着“确认委身者”、“建造核心团队”的真诚努力之后，一种令人不安的、如同锈迹般缓慢浮现的副作用，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沉默地感知。

这种副作用表现为一种难以定位的寒意。一间教会的架构日益完善，各项事工的流程精确如一条润滑良好的流水线，主日程序单上列满了应当被感谢的名字。然而，另一些人的身影，却在每一次的感谢、每一次的年终嘉许、每一次的“同工呼召”中被更牢固地锁定于一种不可见的位置。他们不是缺席者，亦非懒惰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是以极重的、不为群体所知的代价，在那些不被任何事工组所覆盖的生活裂缝中，年复一年地、不可核算地承托着他人的生命。他们陪伴婚姻破碎的弟兄在深夜街头走了几个月的路，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一个远方的、下落不明的名字跪祷，他们在所有人都不愿触碰的、黏稠而沉重的创伤现场沉默地收拾残局。然而，在教会那套用以识别和肯定“谁在建造教会”的认知框架里，他们的行动却始终无法被注册。问题并不在于教会有意地拒绝他们，而在于教会的“识别系统”根本无法“读取”他们——因为在那个系统用以扫描“服事”的雷达上，他们的行动没有返回任何信号。

本文要命名并穿透的，正是这一现象背后那个更深层的、结构性的机制。但在此必须立刻做出一项根本的姿态决定：本文不把这一机制视为一个“故障”，一个由于管理学的偏误或个别人的疏忽而产生的、有待修复的偏差。相反，本文将其诊断为一场从未被正式承认的矛盾的必然显现。这个矛盾的一方，是恩典的不可核算性——上帝称罪人为义，不依据这人任何可量化的善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是一次彻底的、不被任何对等回报逻辑所驱动的恩典事件；那些最深地参与在基督这舍己形态中的生命行动，也因此天然地抗拒任何以“可量化产出”为基准的评价。这个矛盾的另一方，是教会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注定需要追求一定秩序、可问责性与资源分配效率的组织，在其建制化进程中，必然会诉诸一套可被公共辨认的语言、标准与量尺，来识别、评价和协调其成员的服事。可识别性，必然要求可核算性——这是一个组织认知的硬边界。

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不是一种偶然的、可以通过“更好的管理”来消除的摩擦。它是结构性的：恩典的逻辑要求教会去看那些在本质上抗拒“被核算”的行动；而组织运作的逻辑则要求教会只能去看那些能够被其评价语法所读取的行动。这个矛盾，没有任何“解法”可以将其彻底消解——你 cannot 通过改革章程来废除恩典的不可核算性，也不能通过呼吁属灵看见来废除组织运作的可核算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这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它意味着，每一次教会发生认知评价层面的

位移——将评价的重心从对不可核算之生命承重的惊叹，滑向对可量化之效能的核算——都不是一次孤立的“失职”，而是那个永不被解决的矛盾，在特定条件下、在特定制度配置中被生产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本文称之为“核算滑移”。

“核算”在此不首先指向财务审计意义上的数字计算。它指的是一个更宽泛、也更隐蔽的评价惯性：将一个人对教会的价值，与其是否占据一个“岗位”、是否参与一个“可被写进报告的服事项目”、其付出是否能转化为“见证”在年会中讲述、其委身程度是否能被一组外部指标——出席率、小组参与度、事工完成量——所度量紧密地挂钩。“滑移”一词则点明了这一过程的两个关键特征。其一，它是温和的、不易察觉的。它不是通过一次性的命令来完成，而是通过无数次日常话语的累积——会议中的一句“这个人似乎不太能配合排班表”、呼召时的“我们需要更多同工进入以下岗位”、年终报告时那套只统计事工时数的表格——在人心的共识层面日积月累地完成的。其二，它可以被理解为“合理”的。当教会规模膨胀、事务复杂化，引入更清晰的岗位描述、更系统的培训体系和更“公平”的基于可观察指标的评估方式，几乎是管理上的必然。核算滑移的危险，恰恰在于它穿着“良好管理”的外衣出场，以至于人们很难在它发生的早期就识别出它对恩典逻辑的慢性侵蚀。

这一机制一旦被激活，它就会系统性地生产一种“认知上的不可见”。那些最接近基督十字架形态的、以主体自身的身体、时间与情感为不可回收之代价的恩典行动，恰恰因为它们不穿着“岗位”外衣、不以“产出”为形态、不可被归入任何一个“事工组”档案，而在教会的评价认知雷达上彻底隐形。它们并非被刻意否定了，而是因为在现有的评价语法中压根没有可以指认它们的词汇，而变成了一种“在存在论上不被看见”的东西。这种不可见，不是某一间教会的特例，而是深嵌在“力图识别恩典的建制”与“恩典本身的不可识别性”之间的结构性不相容。认知感官的失灵，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它将在下文的制度与叙事分析中被逐一解剖。

在进入论述之前，有必要交代本文的方法、田野基础与局限。本文的核心案例来自笔者于2015至2022年间，在华东某省会城市三间家庭教会（一间改革宗背景、一间福音派独立教会、一间五旬节背景）进行的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三间教会规模从百余人的聚会点到逾千人的大教会不等，建制化程度亦有所差异。访谈对象计三十七人，包括主任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及普通会友；所有受访者均已知情并同意其经历以化名形式被用于学术研究。文中所涉个案，均系笔者直接观察或首次访谈所得。这一田野基底赋予了本文论证以不可替代的经验厚度——它不是在书斋中推演出来的“应然”批判，而是从真实的生命擦痕中被逼出来的“实然”判断。

本文的论述将严格限定于地方堂会的现场。正是在这个场域中，制度的核算逻辑与具体的、带着血肉的生命行动之间的摩擦最为刺目、最为无法回避。而本文将竭力论证的下述判断，其证伪条件只有一个，但它在全文展开后将被置于结论的最后一道句子里，如同悬在整篇论文头顶的一把刀：如果在那些有意识地、以非工具化的方式去“看见”和“承接”不可核算之生命承重的教会中，这些恩典行动在被如此对待之后，反而系统性地、可重复地因被“标签化”或“仪式化尊崇”而消散或变质——

不是一两间教会的偶然波动，而是在多间认真实践的教会中呈现出稳定的、负面的方向性——则本文的核心判断即告失效。

二、生命的擦痕：两个发生在核算筛网边缘的个案

在给出任何概念界定之前，我们需要先把手伸进泥土，去摸那些骨头的形状。以下两个个案，来自笔者2015至2022年间在华东某省会城市三间家庭教会的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它们不是为预制的概念提供注脚，而是概念本身从中被逼出的活骨。

我们要进入的第一个生命坐标，是一位年长的女性，笔者称她为林姨。林姨识字不多，近乎文盲。她一辈子没在教会里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从未被邀请在小组分享中带过一次祷告。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她所有的“服事”，只聚焦于一件事：为这间教会的牧师和每一个她能叫出名字的会友，按着次序，每天代祷。她的方法是古旧的。她有一本手写的、纸张已经泛黄卷边的名单册，上面的名字有些已经离开这间教会三十年了。每天凌晨四点半，当她因年老而难以深眠时，她便起身，跪在床边，开始一个一个地为这些名字向上帝倾诉。她不为他们求富贵、求顺利。她只反反复复、在旁人听来或许极其单调地祷告一件事：求主保守他们的信心，求主不要让他们在这世上的劳苦愁烦中，丢了起初那份向着主的爱心。她不知道，她的许多祷告对象早已更换了城市、甚至已经不在人世。她只知道，这是上帝交在她手上的。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在，她就要为他们守望。

她在这间教会聚会了逾四十年。在她人生的最后十年，这间教会从一个几十人的聚会点，发展为一间拥有千人规模、各项建制完备的城市大教会。在她离世前的那个冬天，教会的年终同工嘉许会办得比往年都盛大热闹。她的名字不在任何一张名单上。她甚至没有收到一张写着她名字的、统一印制的感谢函。笔者在她生前最后一年曾与她有过数次长谈。当被问及是否感到自己不被看见时，她的回应令人震动且深深困惑。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不是为教会做的。我是为主做的。主看见了，就够了。”然后她又加了一句，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如果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也能偶尔对我说一句‘谢谢你’，我想……我也不是不需要的。”

这里藏着一个本文不能回避的神学逼问：如果林姨自己与上帝的垂直关系，已经足以使她行动的意义在永恒中完全饱和，那么本文为她、为像她一样的人发出的那一声“你们没有被看见”的公愤，其合法的边界在哪里？这是在替她向教会讨一份她并不真正需要的认可吗？还是说，这种义愤的底下，藏着本文作者自己对“教会应当是一个完美的共同体”的未被审查的期待？

笔者对这一张力没有完美的解答，但必须在这里做一个诚实的划线：本文的全部论证，不是要代林姨们要求教会的赞美，而是揭示一个认知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即教会的那套评价体系，在声称要“认出上帝在群体中的工作”的同时，却系统性地丧失了识别某一类最接近十字架形态的恩典行动的感官能力。“不被看见”的悲剧，不在于某个具体的行动者因此受伤（虽然有些人确实会受伤，也有些人如林姨一般，在垂直的凝视中找到了几乎完全的满足），而在于那个声称要“彼此相通”的

身体，在认知层面大面积坏死了它本应最敏锐的神经网络。肉身中发生的恩典行动，无法被那肉身感知——这就是悲剧之所在，无论被忽略者本人是否为此感到痛苦。

她离世后，她的儿女在整理遗物时，将那本破旧的、写满了人名的册子带到教会，许多人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那是一次短暂的、集体的震撼。牧师红着眼眶说：“我们中间失去了一位真正的代祷者，这是教会的莫大损失。”然而，这句话本身在因果论的层面，就是一个严厉的讽刺——将她称为“教会的莫大损失”，恰恰承认了四十年来，那个被称为“教会”的集体意识中，从未真正容纳过她的存在。她的存在，只是在转换为“损失”这个可以被核算的负面清单时，才第一次被那个评价系统所捕捉。而在这之前，她那每一天真实的、以膝盖献上的灵祭，在这个评价系统里，从未被注册过哪怕一个字节。

第二个生命坐标，是一对中年夫妇，笔者称他们为陈弟兄和周姐妹。他们自己经营一个小生意，家境并不宽裕。在过去十年间，他们持续做着一件没有任何“事工名称”的事：接纳和陪伴从破碎家庭中出走的年轻人。他们的家是一间不大的公寓，沙发常年被打开用作床铺。他们不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也不会讲高深的道理。他们只是让这些充满愤怒、迷惘、有时甚至举止粗野的年轻人住下来，和他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听他们抱怨，在深夜里等他们回来，在他们又搞砸一件事的时候，一边叹气一边帮他们打下一通需要低声下气的电话。

他们为此付出过金钱、时间、心力，也承受过来自对方亲生父母的不解与指责。笔者曾问陈弟兄，教会知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件事。他笑了一下，说：“牧师知道。他有一次在私下对我说：‘你们真的很有爱心。’然后就没有了。”他们从未在任何一次小组聚会中站起来作过“见证”，因为这件事太长、太琐碎、太没有“得胜的结局”可以总结了。十年来，他们只是在那里。他们的事，没有被纳入“青少年事工”的报告（因为他们没有走事工流程），没有被算为“关怀探访”的业绩（因为他们不是在“探访”，他们是在“生活”），甚至无法被归类为“接待远人”（因为这些年轻人不是从外地来的，就是从同一个城市破碎的家中逃出来的）。在教会那套分类体系里，他们的行动没有落进任何一个可用的框格。

他们没有入选任何一届执事会，没有被提名过任何一项表彰。当教会的牧者偶尔在私下谈话中提起他们，所用的辞令不外乎“那对很有爱心的夫妇”。这句话听起来是赞美，但它在群体公共决策中的实际效力是零——它不被转化为任何一条纳入考量的事工预算，不被转化为任何一个需要被咨询的岗位设置，更不被转化为任何一个在公开场合被宣读的名字。它是核算体系用来安放那些自己无法读取之事物的一个礼貌的、无害的、不打乱任何现行秩序的“收容所”。

这两个个案绝非孤例。在笔者的田野笔记中，类似的故事反复出现：那个每个主日清晨提早来修理松动座椅的弟兄；那个二十年来默默为教会厕所补充卫生纸、从未被人问起名字的姐妹；那个在教会搬入新堂后，每个周末独自一人打扫整栋楼、却在“教会大扫除日”的集体合影中永远站在最边角的身影。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行动都发生在教会正式事工架构的缝隙里。他们不占据任

何“岗位”，他们的付出不被任何“排班表”所记录，他们所承托的，往往是那些无法被归入任何一个“事工项目”的、黏稠而沉重的人类苦难。而正是这些行动——这些以主体自身的身体、时间与情感为不可回收之代价的、不追求任何可识别果效的恩典行动——最接近各各他十字架那沉默的、不被门徒认出的承重形态。

现在，我们需要从这两根骨头开始，反向拼出那个尚未被命名的形状。这些行动可以被归入同一类别，不是因为它们共享某个可见的“功能”，而是因为它们共享三种逃不掉的特征。第一，非产出导向：其行动不以任何可预期的、可被写入报告的“成果”为目的，甚至行动者本人也无法预知其行动的“果效”。第二，非岗位载体：其行动不依托于教会的任何正式事工岗位，不在任何排班表或组织架构图上，它发生在岗位与岗位之间的缝隙中。第三，以主体自身的身体、时间与情感为不可回收的代价：行动者为这些行动付出的，是他们生命中不可再生、不可被任何资源所“补充”的那一部分——深夜的清醒、膝盖的疼痛、心中对另一个生命的重量的无声承托。这三个特征，使得这一类行动在本质上抗拒任何形式的核算：你无法用小时数计量它，因为你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是“服事”、哪一部分是那个人生命本身不可分割的质地；你无法用“果效”评估它，因为它的果实常常藏在另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在不为人知的时刻、以无人能追踪的方式成熟。

在下文中，我们将用“不可核算的生命承重”来指涉这类行动。这个命名不是预先造好、然后拿去套案例的；它是从林姨的膝盖和陈弟兄的沙发里被逼出来的——先有骨，后有名。这正是发生学的根本姿态：概念不是论证的起点，而是论证从肉身擦痕中走完一圈之后，必须给出的那一声回应。

三、制度的齿轮：核算滑移在结构中的动力机制

上一节摸到的骨头告诉我们，有一类行动在教会的认知雷达上彻底隐形。这一节要追问的是：那个雷达本身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并非要审判任何人——恰恰相反，本文的全部论证都将恪守一个原则：不对任何个体的动机做有罪推定。那些参与制造这套评价体系的人，大多数是善意的、敬虔的、真心想要“把教会建造得更好”的肢体。问题从来不在于人心的邪恶，而在于：当一个以恩典为根基的群体，在追求秩序、可问责性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启动一套认知评价机制；而这套机制在运转中，会不可遏止地生产出一个它自己无法看见的盲区。这不是人心的故障，这是结构的悲剧。

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诚实地承认：制度分科本身不是恶。《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的使徒选立七执事管理饭食的事件，恰恰是初期教会在面对规模增长时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制度创新——它避免了说希腊话的寡妇被忽略，也释放了使徒得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问题从来不在于分科本身，而在于分科逻辑一旦启动，就有一种将一切纳入可核算范畴的内在倾向。这不是任何人的恶意，而是任何以“清晰责任、可问责流程”为目标的分科系统，在运作中所必然产生的认知窄化：它能看见那些落在其责任网格之内的事物，并且看得异常清晰；但它对那些落在网格缝隙中的事物

，则施加了一种制度性的盲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进入“齿轮”的分析——不是要把制度妖魔化，而是要追踪它那种无法自控的、将不可见者推入更深黑暗的惯性。

3.1 第一台机器：功能性的组织分科

任何组织，当其规模从一个彼此熟识的大家庭迈入一个需要流程管理的复杂机构时，分科是必然的路径。教会概莫能外。然而，分科制度一旦启动，就携带着一种几乎无法抵抗的逻辑惯性：它将整个群体的生命切分成若干块责任田，每一块都配以明确的负责人、操作流程和监督机制。责任的清晰化，必然对应着责任的边界化。那些落在所有责任田的缝隙里的、那些无法被任何一块责任田清晰划界的真实的、具体的苦难与需要，就会从“有专人负责”的安全网中漏下去。

而深层承重者们所做的，恰恰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堵住这些被分科逻辑必然漏掉的窟窿。林姨的代祷，不属于“祷告事工”（因为她不在任何祷告组的排班表上），不属于“牧养关怀”（因为她从未被委派去“关怀”任何一个人），亦不属于“宣教代祷”（因为她代祷的对象是这间堂会自己的会友，而非远方的宣教士）。陈弟兄夫妇的陪伴，不属于“青少年事工”（因为他们没有走事工申请流程），不属于“婚姻辅导”（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亦不属于“慈善救助”（因为那些年轻人的家庭并非经济困难）。这两个真实的、沉甸甸的生命承重行动，在数块责任田的边界之间，掉入了那个深不见底的“无”的领域。但正因为这些窟窿不在任何一块责任田的界址之内，他们的堵漏行动，也就在制度档案中被归属到了“无”。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职。这是任何分科体系在与生命的不可切割性相遇时，都必然产生的一种“制度性漏损”。

3.2 第二台机器：以可量化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麦加文和瓦格纳为代表的教会增长运动，对全球城市教会建制化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麦加文在《神之桥》中提出“同质群体原则”，主张教会增长应聚焦于特定的、社会学意义上同质的群体单元；瓦格纳在《你的教会可以增长》中进一步将这一原则操作化为一套清晰的、可供各地堂会复制的方法论：设定可测量的增长目标、追踪关键绩效指标（出席人数、小组繁殖率、受洗增长率）、以数据为导向来评估一间教会的“健康度”。这些工具在短期内的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度与驱动力，但它也悄然地在教会领袖和会众的心智中植入了一种“核算本能”：只有可以被计数的，才算是真实的产出；只有可以被报告的，才算是值得关注的服事。

当这套本能与地方堂会的年度报告、财务预算和事工述职深度捆绑之后，一个人对教会的价值，开始在不经意间被转化为一组可被摆上台面进行横向比较的数字。一位每周花十五个小时陪伴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走出死荫幽谷的弟兄，其“服事产出”在报表上几近于零，因为那个被陪伴者并没有因此“受洗”，这个过程也没有被纳入“关怀事工”的正式流程。与此同时，另一位在招待团队中准时出席、从未迟到的弟兄，则有一个明确的“全勤”记录可以被表彰。在核算逻辑的凝视下，前者的行动因其不可穿透的厚度与无法预设的结果，而被判定为不可见的；后者的行动因其清晰、可靠、可

预期，而获得了全部的可见性。核算滑移正是在这一刻完成的：它不是在比较两者的价值——它根本丧失了评价前者价值的感官能力。它的评价坐标轴上，前者的位置压根不存在。

3.3 第三台机器：“核心同工”与“普通会众”的二分——从组织必需到属灵等级

几乎所有的城市教会，在心照不宣间都使用着这套分类法。它在运作逻辑上是自洽的：教会需要一群可靠的、经过培训的、在信仰和品行上经过考验的人来承担带领与关键服事的责任。然而，当这个分类被静静地、不加反思地等同于“委身者”与“被喂养者”的区分时，一个灾难性的结论就被隐含地生产了出来：那些不占据任何“核心同工”岗位的人，自动地被归类为灵命尚浅的、需要被更多关照和推动的“边缘者”。

这一偷换不是通过某一次正式宣告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日常的话语实践中，无声无息地沉降为一个群体的共识的。在讲台的呼召中，“我们需要更多同工”这句话，几乎总是紧跟在一份具体的、可辨认的岗位清单之后——招待、诗班、儿童主日学、投影——这就在会众的心智中将“同工”与“占据一个岗位”焊在了一起。在小组公约的条款中，“委身”被操作性地定义为“按时出席小组聚会与主日崇拜”——这就在评价层面将“委身程度”与“出勤率”画上了等号。在会众的日常谈资中，“某弟兄很爱主”这句话，最常出现的语境，是他“在教会里做了某某事工”——这就在叙事的层面完成了“属灵分量”与“可汇报之事工量”的连接。

当这一系列话语通道日复一日地运转，它们所生产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为了方便管理而设的分类，而是一个被悄悄植入的“属灵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的顶端，是那些将时间与精力大量投入可核算之事工的人；在底部，是那些“只参加主日崇拜的平信徒”。这个等级秩序一旦内化为群体的常识，教会就在事实上采纳了一套靠行为称义的救恩论——只不过“行为”在这里被换成了“事工参与度”。而那位几十年如一日在凌晨为教会代祷的老姐妹林姨，她的名字不在任何一张同工名单上；她的灵命状态，被她的岗位缺失所定义的“普通会众”这个身份，给低判了。她献上的是教会的属灵地基，但她得到的评价却是“还在边缘，需要更多融入小组生活”。这就是核算滑移在肉身层面的伤口：它将那些本应是教会承重脊梁的人，制度性地识别为群羊中最不成熟的一群。

3.4 “滑移”的必然性：一个互锁的回路及其在决策现场的慢镜头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那个必须被正面质问的问题：为什么核算滑移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一句修辞上的夸张，而是可以从上述三台机器的交互中得到结构性论证的判断。

核算滑移的“必然性”，不来自人性的软弱（虽然软弱加重了它），也不来自个别人的管理失误（虽然失误让它更刺目），而是来自一个三元互锁的回路。教会规模的扩张，催生了对可复制性的需求——教会需要一套不依赖于特定个人魅力或特殊恩赐的、可以被传授、被复制、被评估的事工模式。这种可复制性一经成为制度目标，就必然要求标准化的评价体系——因为唯有标准化，才能在横向上比较不同堂会、不同团队的“绩效”，并在纵向上追踪“增长”或“衰退”的趋势。而标准化评价

一旦建立，它就会天然地偏好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指标——不是因为任何人都恶毒地想要忽视不可量化之物，而是因为标准化评价的操作语法，就是计数、比对、排名。这双眼睛天生只能看见可度量之物。当这三者——规模扩张→可复制性→标准化评价→可量化偏好——首尾衔接、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回路时，“滑移”就不再是一次性的决策失误，而是这个回路在每一次运转中都在重新生产的一种稳定的、认知层面的位移。

但这还只是齿轮图纸。要看到齿轮的咬合，我们需要一场慢镜头。

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曾获准旁听某堂会的年度执事会扩大会议。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程，是讨论“年终感恩聚会中应当特别感谢哪些肢体”。会议开始的气氛是真诚而热烈的，执事们依次提名。一位执事提名了招待团队的小李，因为她“一年来从未迟到，还主动顶了好几次别人的班”。这个提名迅速获得一致通过——出勤记录是可查的，顶班次数是清晰的。接着，另一位执事提名了带领敬拜的赵弟兄，因为“这半年敬拜的氛围越来越好，每周参加的人数也有上升”。这个提名也没有争议——人数是硬指标。三位执事之后，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姊妹轻声说了句：“那个……张姐呢？她好多年一直在帮教会里几个独居老人买菜。”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回应：“买菜这个……好像不算是教会的正式事工吧？”又有人补充：“我们也不知道她具体做了多少，不好衡量。”坐在主位的牧师沉吟片刻，说：“这样吧，我们今年可以在感恩聚会上，有一段整体性的感谢，感谢那些在私下默默服事的弟兄姐妹，就不单独提名了。”没有人反对。没有人恶意。每个人都是善意的、敬虔的。然而，决定已然被做出：可核算的被单独提名、被登上屏幕、被全体掌声肯定；不可核算的被整体性地、不具名地“概括”进一段话里。

那个会议室里发生的，正是核算滑移在实况转动。它的每一步都“合理”：不清楚的事怎么表彰？没有记录怎么量化？但如果把“表彰”的语法换成另一种——“我们要不要花一个下午，请那位张姐来小组里坐坐，就听她说说那些老人，不记录，不总结，就只是听”——那番话不需要那张表就可以成立。一场走下来，没有人“犯错”，但第一类声音自然而然地挤出了第二类声音。那天晚上，我走出教会，想起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人的话：“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又想起自己刚看过的议程表上，一排排的格子：岗位名称、出勤天数、受益人数。那格子不算窄，但装不下张姐的塑料袋——她是每周五下午，手里攥着塑料袋，在菜市场里为三个膝盖不好的老人挑便宜的菜。天知，她知，格子不知。

四、叙事的语法：被收缩的“舍己”与被规范的恩典

如果说制度的齿轮为核算滑移提供了运动的骨架，那么教会内部共享的叙事语法，则为其注入了合法化的灵魂。制度只能将人分类，叙事却告诉人们，这种分类是正当的、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在当代华人城市教会的语境中，这种叙事的最强载体，就是一套被特定方式解读和传讲的“舍己”与“委身”的话语。

本文在此使用的“语法”一词，并非取其句法学含义，而是指一套规定什么能被说出、什么能被识别为有意义的、什么能被提升为群体公共叙事的深层规则。这套规则往往是隐性的——没有一份教会章程会明文规定“只有可量化的服事才算委身”，但当一个群体的公共话语在日复一日的运转中，只将“委身”一词与“参与某某岗位”绑定、只将“舍己”的典型图像等同于“放下个人计划来配合教会安排”时，一套事实上的叙事语法就已成形。

讲台上反复传讲着一个完全符合新约教导的异象：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应当舍去自己旧生命的舒适与喜好，应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群体中殷勤地运用恩赐彼此服事。这套话语的崇高性与真理性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话语在传递的途中，总会不知不觉地和制度的逻辑结婚，生下一种被规范过的“示范性解读”。在教会生活中，“舍己”这一极其丰富的、指向一个人内在生命整体性转向的神学概念，开始被逐步转译为的一组可以清晰辨认的举动：放下自己的时间安排，来参加教会的各项聚会和培训；回应教会的需要，承担一项自己可能并不擅长、但组织目前很紧缺的岗位；在个人利益与整体计划冲突时，优先考虑后者的达成。

必须再次申明，这些举动本身是好的。它们需要教导，需要鼓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这些具体的、高度适应组织运作需求的举动，开始垄断和穷尽“舍己”一词在教会公共叙事中的全部含义时，一场语义的政变就悄悄地成功上演了。与此同时，另一种同样要求付出巨大个人代价、却完全不服务于组织运作效率的行动——例如，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废墟中长期地、无望地、不求任何改变的陪伴——开始在这个叙事的语法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它也是一种舍己，甚至是一种更接近各各他十字架那种“与罪人认同、共受苦弱”的舍己。但它不帮助教会增长，不优化敬拜流程，不影响任何一项年终考核指标。于是，在一个被组织的核算逻辑规训过的叙事体系里，这种行动就不那么像是“舍己”了。它最可能的归宿，是被归类为“个人的爱心”——值得私下肯定，但不值得被提升为群体性的教导范本。

赞美的流向，是叙事语法发生扭曲的最显著指征。在每一年年终的同工嘉许会上，那些名字被念到、事迹被传讲、获得掌声的人，几乎无例外地是那些在第一种舍己上表现卓越的成员：他们忠心完成了某件事工的服事，他们积极参与了教会的某项建造计划，他们在回应教会某项呼吁时做出了可被看见的牺牲。这些肯定本身没有错误。但它们像聚光灯一样，将公众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舞台上。舞台周围那广阔的、支撑着整个剧院不至坍塌的地基，就因此被投入了更深的阴影之中。当那位每个主日清晨提早来修理松动座椅的人意识到，他的行动永远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被聚光灯照亮的舞台上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毒的、缓慢浸透心灵的寒凉：原来我这份不能用嘴说清楚、只能用我整个身体去做的爱，在这个共同体的正式叙事里，竟然没有一个是属于我的。

叙事垄断一旦完成，它就会和制度的滤网构成一个自锁的回路。制度筛出可量化的服事，叙事赞美它；赞美强化了其在群体中的可见度与吸引力，吸引了更多模仿者；制度的量尺因此获得更多

的经验证实，从而在下一次修改章程时，变得更加精细和牢固。深层承重者们，则在这个回路的每一次循环中，被更进一步推向边缘。他们不是被驱赶出了教会，他们只是被不可逆地从教会关于“谁在建造我们”的自我意识中，被注销了。

五、被四个邻居遮蔽的盲区：与既有概念的严格对勘

前文的制度分析与叙事批判，已经摸到了“核算滑移”赖以运作的骨骼与肌肉。但一个严谨的概念若要立住，不能只靠对现象的生动描摹和内部的逻辑自洽，它还必须经受学术谱系中最相近概念的严格对质。如果它能被一个现成的、已经广为学界接受的概念所无损耗地替换，那么它就没有权利作为一个新概念被制造出来。

本章将“核算滑移”与四个最可能被用来替代或涵盖本文核心论述的既有概念——韦伯的“理性化”、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格林利夫的“仆人领袖”，以及约德尔关于教会作为“另类共同体”的论述——进行对勘，以逼出它不可替代的辨别面。其中，与韦伯的对话是本章的绝对重心：它不是一场横向的“指出不同”，而是一场纵向的“竞争性诊断”——让韦伯的理性化框架对林姨案例给出一个完整的、同情的诊断，然后指认这个诊断在何处、因何故、以何种语法崩溃。

5.1 与韦伯“理性化”的对勘：竞争性诊断

首先，必须直面那个最危险、也最无可回避的对话者：马克斯·韦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奠定的理性化理论，洞察到现代组织的一个根本趋势：随着规模的扩大与复杂性的增加，组织的运作将越来越依赖于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非人格化的规则体系。这一趋势在宗教组织中同样生效——韦伯本人就讨论过卡里斯马权威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日常化”，即被制度建设所吸收和驯化。教会增长运动的数据化管理、岗位化、考核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卡里斯马日常化的经典案例之一。一个尖锐的问题因此摆在面前：“核算滑移”是不是韦伯理性化概念在教会场域的一个地域性变体？

以下，本文采用“竞争性诊断”的结构来回应这一问题：首先，让韦伯的理性化框架对林姨案例给出一个尽可能完整、尽可能同情的诊断；然后，评估这个诊断的解释覆盖率；最后，精确标定那个韦伯的理论语法无法覆盖的硬核。

韦伯诊断的第一步：林姨所属的教会从几十人的小群体发展为千人大教会，这是一个规模扩张触发理性化的标准起点。早期小群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具体的、全人的、不可替代的；卡里斯马型的属灵权威——可能是创始牧师的讲道恩赐或某位属灵长辈的祷告能力——足以维系群体的凝聚力。但随着规模增长，这种基于个人魅力的整合方式变得不再够用：会众人数太多，牧师无法认识每一个人；事工复杂性增加，口头协调必然导致混乱。于是，“卡里斯马的日常化”被触发——教会开始引入非人格化的规则体系：岗位描述、排班表、培训课程、事工考核。

第二步：规则体系一旦建立，它就必然倚重可计算性。教会需要知道招待团队的出勤率，以便决定下周需要临时招募多少人；需要统计小组出席人数，以便评估小组长的牧养效能；需要记录受洗人数，以便在年度报告中向会众和外部支持者交代“上帝的带领”。在这个过程中，教会的心智——无论是领袖还是会众——被训练为一种“核算本能”：只有被纳入这表格的，才算“服事”；只有在表格上有位置的，才值得被关注和激励。

第三步：那些落在表格之外的人——比如林姨——就必然被边缘化。这不是因为任何人对她怀有恶意，而是因为科层制的认知网格在要求清晰责任的同时，必然对那些落在网格缝隙中的行动施加一种制度性的盲目。在这个意义上，林姨的不可见，是理性化的标准产物：她是那个被非人格化规则体系漏掉的、无法被量化的、因此无法被注册的“非正式行动者”。

韦伯的这套诊断，对林姨案例的解释覆盖率高得惊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教会在规模小时没有这个问题、规模大时必然出现这个问题；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任何人主观上想要忽视林姨，但所有人都在客观上、默契地忽视了她；它甚至可以在一定层面上解释林姨那句“主看见了，就够了”——那是一个被科层制边缘化的个体，通过强化垂直的、私人的宗教体验来为自己的不可见赋予意义的策略。截至此步，韦伯的诊断覆盖了大约85%以上的现象。

那么，那个韦伯覆盖不住的15%是什么？

它不在“核算”这一侧——韦伯对核算的运作机制已经说了几乎所有能说的话。它在“恩典”这一侧。

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是一套中立的、适用于任何组织类型的描述工具。它可以解释一间汽车工厂的铁笼、一个政府机构的铁笼，也可以解释一间教会的铁笼。但正是在这个“也可以”中，藏着韦伯理论语法的根本局限：它无法——因为它是中立的——区分“在教会内发生的理性化”与其他任何组织内发生的理性化，在神学意义上的质的差别。对韦伯而言，教会的理性化只是“又一个组织”在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宿命，它与银行的理性化、军队的理性化共享同一套动力学。因此，韦伯可以为教会的理性化提供一套完整的发生学描述（它如何发生），却无法提供、也不预备提供一套神学裁决。

而这个神学裁决，恰恰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会不是“又一个组织”。教会是地上唯一一个在存在论层面宣告“我们不是靠我们的产出被衡量”的群体。她的立身之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花了一整本信来论证的那件事——是上帝称罪人为义，不依据这人任何可核算的善行，而是依据基督在他之外的、被白白归算给他的义。因此，当核算逻辑在教会内运作时，它所发生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组织从非理性向理性的一般性过渡。它发生的是这个：一个以“白白的恩典”为根基、以“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为认信中心的群体，在运作中采用了一套事实上靠行为称义的评价体系来识别和尊崇其成员的委身。

理性化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可能致铁笼。但只有当它发生在那个宣称自己的主是被帝国和宗教权威联合核算、审判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教会时，它才同时构成了一种对恩典本身的系统性的、日常的背叛。韦伯能告诉你铁笼是怎么焊起来的，但他不能告诉你，当铁笼被焊在圣殿里时，它不仅仅是管理学的铁笼——它还是对基督十字架的一次沉默的、结构性的拒绝。

这就是那15%。它不是韦伯“说错了”什么，而是韦伯的论证逻辑在触及那个神学悖谬时，语法崩溃了——他无法说出一句他作为社会学家不被允许说的话：在这一个特定的组织中，理性化不仅是效率的代价，更是对组织立身之本的否定。因此，“核算滑移”不是一个发生在教会组织中的韦伯式理性化（那是一阶概念），而是对“发生在教会中的理性化”这一现象的一次神学—发生学命名（这是二阶概念）。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描述的是铁笼的焊接工艺；“核算滑移”命名的是，当这铁笼被焊在圣殿里时，它不仅囚禁了行动，更亵渎了圣殿本身。这是韦伯装不下的辨别面。

5.2 与布迪厄“符号暴力”的对勘：权力维度的补充与不充分

审慎的读者在此可能会提出另一个有力的竞争者：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概念。布迪厄揭示了一个远比韦伯更隐蔽的权力运作机制：一个社会场域中的支配秩序，并不是通过赤裸裸的强制来维持的，而是通过将一套任意的分类标准“自然化”为不言自明的常识，使被支配者本人也在认知和评价层面接受了这套标准，从而将自己的被边缘化误认为理所当然。

乍看之下，这一概念与“核算滑移”呈现出惊人的契合。本文所揭示的，正是教会内部一套关于“何谓真正的服事、何谓真正的委身”的分类标准，被逐步自然化为群体的“常识”。深层的承重者们被这套标准判为“不可见”，甚至他们自己也可能在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判决——林姨那句“主看见了就够了”，也可以被解读为她对这套分类秩序的内在化。她不再争取被教会的公共叙事所看见，是因为她已经在最深的心智层面接受了“我的行动不属于那个可被叙事的类别”。这确实是符号暴力最精致的运作形态。

然而，布迪厄的框架在面对林姨案例时，同样有一个覆盖不到的死角。在布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中，被支配者接受的那套分类标准，是一个被建立起来用以维系特定社会秩序的任意构造。它的合法性是虚假的、可被揭露的。因此，符号暴力的批判逻辑，最终指向一个清明的、祛魅的启蒙时刻：当被支配者识别出那套分类标准的任意性时，她就从它的魔咒中醒了过来。

但林姨的行动逻辑，恰恰不是在等待这个启蒙时刻。她为之奉献一生的那件事——在凌晨的床前为那些名字祷告——其意义的根基，并不依赖于教会的评价体系是否承认她。她的行动，有一套完全异于“教会评价体系”的垂直坐标系：她被一位她所相信的上帝所知道，这个“被知道”对她而言，在终极意义上是完全充足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将她简单地套入布迪厄的“被支配者”模型，我们就在分析的原点处，抹去了她作为一个认信主体的能动性——她的那套垂直坐标系，不是对“被教会忽视”的创伤性补偿，而是她的行动自始就扎根于其中的独立意义来源。

因此，布迪厄的符号暴力可以极好地解释教会那套分类标准是如何被自然化的、以及许多被忽略者是如何在认知层面接受这一判决的。但它无法解释——因为它的理论框架不预留这种可能性——何以在完全接受那套分类标准（即接受“我的行动不在教会的可见范畴之内”）的同时，一个行动者仍然可以在另一套完全异质的坐标系中，找到她行动的意义的完满饱和。这恰恰是林姨身上那个最不能丢失的特征。核算滑移的判断，因此不能简单地被布迪厄的符号暴力所涵括——后者能够揭示评价体系的权力运作，但前者还必须同时持守一个神学人类学判断：被那套评价体系判为不可见的人，有可能同时是在上帝面前被完全知晓的人。这两个命题必须同时被说出，而布迪厄的概念语法无法容纳第二个命题的出现。

5.3 与格林利夫“仆人领袖”的对勘

第三位对话者，是格林利夫的“仆人领袖”。格林利夫在其奠基性短文《仆人即领袖》中发起的仆人领导运动，对现代管理学及教会领导力话语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洞察到传统的强权型领导模式正导致制度的腐败，并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倒转：真正的领袖，首先是一个仆人。领袖的试金石，不在于他有多大的权势，而在于那些被他服事的人，是否因此成长为更健康、更自由、更有智慧的人。

然而，格林利夫为“仆人领袖”给出的那个核心检验标准——“那些被服事的人，是否因此成长了？”——恰恰暴露了这个概念为什么无法涵括林姨们的行动。格林利夫关注的是服事的果效：服事是为了让他人成长。打一个比喻：一个仆人领袖会弯下腰，为他的团队洗脚，目的是让团队的成员在经历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被尊荣之后，能够站起来，更卖力、也更有凝聚力地去建设异象之城。他的洗脚，是一种通向更有效建造的途径。

现在，让我们再回去看林姨。她弯下腰，在凌晨的床前为那些名字祷告。那些被代祷者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代祷，因此并未因为她的代祷而“成长为更健康、更自由的人”。她的行动，从格林利夫的检验标准来看，是“无效”的——因为她没有产生可被识别的果效。但这恰恰是她的行动最接近十字架之处。她的代祷的意义，不是由它所产生的可识别果效来追认的；它自身就携带着它全部的价值与重量——如同马利亚倾倒的那瓶真哪哒香膏，它的价值不在于它“做成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倒出了”。在“仆人领袖”的框架里，服事是一支瞄准“领导力”与“果效”的箭；而在林姨那里，服事本身就是靶心。她是不携带任何“领导”后缀的、不追求任何可识别果效的、自足的仆人。“仆人领袖”这个概念因此无法涵括她；当她被错误地揽入这个名义下时，她最根本的那部分——那份甚至不需“他人成长”来为自己证明的纯洁——就会被“领袖”一词所隐含的效能指向所污染和扭曲，从而在实质上被再次遗忘。

5.4 与约德尔“另类共同体”的对勘：内部裂隙 与 外部区分

最后，本文必须与一位比前三位都更接近的神学邻居对话：约翰·霍华德·约德尔。约德尔在《耶稣的政治》中，有力地论证了教会的本质不是一个提供宗教服务的机构，而是一个被耶稣基督的主权所塑造的、与世界权力逻辑截然相反的“另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权力的运作方式不是强制的、自上而下的，而是通过彼此顺服、通过拒绝使用世界的暴力与算计手段来见证那将要来临的国度。约德尔的论述在许多层面上与本文的关切高度共振：我们都拒绝将教会简化为一个“高效的宗教组织”，都坚持要恢复那些被主流组织逻辑所排斥的、软弱的、非功利的行动在教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然而，约德尔的分析轴，重点在于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外部区分——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通过其独特的、非暴力的伦理实践，向世界做出可见的见证。而本文的分析轴，重点在于教会内部的认知裂隙——那些发生在教会内部、在同一个群体的“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区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约德尔告诉我们，教会应当作为一个整体与世界有所分别；本文追问的是，即使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告白上与世界分别了，她内部的那套用以识别“谁在建造我们”的认知机制，是否仍然可能被世界的核算逻辑所深刻规训，以至于她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将自己内部最接近基督十字架形态的那些行动，从她的自我意识中驱逐了出去？约德尔回答的是“教会应当是谁”的问题；本文回答的是“教会内部是如何在自己的评价体系中，将自己已经拥有的那最宝贵的一部分，系统地识别为‘无’”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级的追问。因此，即使约德尔的“另类共同体”论述在神学上与本论文深度共鸣，它也无法替代“核算滑移”所要诊断的那个内部的、认知-评价层面的发生学机制。

5.5 不可替代的辨别面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划出那个属于“核算滑移”的、不可被四位邻居替代的辨别面。本文所建构的论述，其分析的核心对象不是一群潜在的、非正式的领袖（格林利夫），不是一个整体的、对外作见证的另类共同体（约德尔），不是任意一个在理性化进程中产生认知窄化的组织（韦伯），亦不是一群在符号暴力中被自然化的分类标准所支配的行动者（布迪厄）。它的核心对象是：一个以“白白的恩典”——即一套彻底的反核算逻辑——为立身之本的群体，在追求组织秩序和可问责性的过程中，因其评价体系的认知窄化，而系统性地、结构性地丧失了识别某一类最接近恩典本身的行动的感官能力。这个现象在韦伯那里被“中立化”为铁笼，在布迪厄那里被“权力化”为暴力，在格林利夫那里被“果效化”为领导，在约德尔那里被“外部化”为对世界之见证——四重遮蔽，无一正面处理“恩典与核算在这一特定群体中的认知不相容”。填补这个由四重遮蔽造成的盲区，就是本文所进行的概念劳动的不可替代性所在。

六、十字架的垂直审判：恩典作为对核算的彻底中断

至此，本文的分析主要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层面展开：它描绘了一种动态，命名了一种机制，并将其与既有概念进行了区分。但对于一篇教会论的神学论文而言，这还远未触及根基。我们必须让整个问题，在十字架的光照下，经历一次毫不留情的垂直审判。

以下部分的分析工具，不再是制度分析与田野叙事，而是认信式的神学判断——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核算滑移如何运作”，而是“在上帝在基督里的那一次恩典行动面前，核算滑移究竟是什么”。

6.1 恩典的不可核算性：因信称义作为反核算体系

本文对恩典与核算之张力的神学建构，主要承接宗教改革中对“因信称义”与“行为称义”所做的根本性区分。这一承接不是为了引入宗派立场，而是为了诚实地表明本文的神学判断有其可追溯的、在教会历史上被反复论证过的传统根基。

在那场十六世纪的神学争辩中，路德洞察到人类宗教本能中最顽固的倾向，就是将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纳入一套可核算的因果框架：我做了某件事，因此上帝应当赐福于我；我犯了某个罪，因此上帝应当惩罚我。而十字架的福音，正是对这套核算本能的彻底爆破：上帝在基督里，将世人的罪归算给祂无罪的儿子，又将祂儿子的义白白归算给不配的罪人。这是一套在世界的智慧看来彻底荒谬的反核算体系。

这体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右面的强盗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彰显。他一生的工作被神判定为“死的”，他人生的账户上没有任何可核算的善行余额。他只做了一件事：在极度的痛苦和公众的羞辱中，转脸向那个同样被钉的人，说了一句：“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没有事工产出，没有品格证书，没有经过任何装备培训，没有在任何小组里被牧养过。他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最赤裸的、毫无任何可夸之处的悔改，抓住了恩典。而耶稣回答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是神圣的、对一切人类核算逻辑的终极暴力。天堂的门票，在这里被一位神赐给了一个在一切人力核算体系中得分为零的、濒死的罪人。这番操作完全不公义、不效率、不激励任何道德进步，它彻底砸碎了所有关于“配得”的算盘。使徒保罗花了一整本《罗马书》来论证这件事的逻辑：上帝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而律法——那套最神圣的、来自上帝自己的核算标准——在称义这件事上，被彻底废除了功用。人称义，是白白地，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原文的意思是：作为一份礼物，没有任何可被核算的原因。

6.2 十字架承重形态的揭示：上帝在人间的承重方式

进一步地，我们必须审视基督自己的身体——他的生死——在这一切中的位置。耶稣自己，当他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确实讲道，他确实训练门徒。但在福音书的叙事中，有极大的一部分篇幅，记载了他所做的那些从任何宣教战略来看都极其“低效”的事：他在拥挤的人群中，停下来，为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在律法上不洁的女人，让医治的大能白白流出去。他日暮时分，在所有人都没期待的时候，独自上山，整夜祷告。他甘愿被一个妓女用眼泪洗脚，用头发擦干，并在众人核算的眼光中，宣布她的罪赦了，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在这些时刻，耶稣不是在“不效率地做事工”，他是在揭示上帝临在人间时真正的承重方式——那是一种不计算、不妥协的、以身体去承受和转化人类苦难的方式。

最终，这一承重方式在加略山得到了极致的启示。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了那位耶稣——那位在一切人的核算体系中被彻底除名的耶稣。在他的时代，罗马帝国的法律核算宣布他为一个叛乱分子；犹太公会的宗教核算宣布他是一个亵渎上帝者；甚至在门徒们那怯懦的个人核算中，他也被划为一项需要及时止损的、失败的投资。他被挂在木头上，赤裸、羞耻、一无所有。然而，正是在这个会计核算的零度零点，也就是那个被全人类所有的评价系统都打上“毫无价值”标签的身体上，上帝使教会——那真正的、超越时空的圣殿——被生出来。教会的根基，不是一个成功的项目，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甚至不是一群勇敢的使徒的优秀品格；教会的根基，是一个在核算中彻底失败的身体所流出的血与水。

6.3 对核算滑移的审判：不是修复偏差，而是承认背叛

将这一切拽回我们讨论的现场，结论是令人无法站立得稳的：教会每一次发生核算滑移，每一次将被钉十字架那般的、软弱的、不可核算的、以身体为代价的恩典行动从她的认知中滤掉，她就是在基督的身体上，重复着罗马兵丁和犹太公会的动作——将那位真正的、神所拣选的房角石，弃之于可见性的视野之外。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忽略”几个不显眼的会友；实际上，我们是在那个具体的历史时刻，亲手将基督重新钉回了一个不可见的角落。

这里必须立刻做一个关乎全文根本姿态的澄清。十字架对核算滑移的审判，不是呼召我们“回到一个没有被核算逻辑污染的纯粹教会”。那样的教会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正如本文在第三、第四节中所竭力论证的，核算滑移的根源不在于人心的邪恶或管理的失误，而在于一个无法被彻底消解的结构性矛盾——恩典的不可核算性与组织运作必然的可核算性需求之间的张力。使徒行传第六章选立执事管理饭食，正是早期教会为应对这一张力的第一次、也是被《使徒行传》正面记载的制度创新。承认核算逻辑在教会的此世建制中不可被完全祛除，不是对信仰的妥协，而是对末后成全之前、教会作为“既是圣灵内住的基督身体、又是由罪人组成的属世组织”这一双重身份的诚实面对。

因此，十字架的审判不是要我们“悔改并回到纯粹的恩典”，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回归的、无核算的纯粹起点。它要我们做的，是一件事关认知核心的更困难的事：它呼召我们在每一次认知到核算滑移已在运作的时刻，撕裂心肠地承认——不是承认“我们犯了一个管理错误”，而是承认“我们又一次在这件事上背叛了那位为我们的背叛而死的基督”。并且，在这一承认之后，不绝望，不放弃建制本身，而是重新把那套已被核算逻辑裹挟的自我意识，再次推回十字架那“白白的”、反核算的审判之下。这不是一次性的回归，这是在余生中反复发生的、绝无毕业可能的操练。

七、反驳的预应：来自三个方向的最强挑战

在进入实践性的结论之前，本文有责任正面推演那些最可能推翻本文核心判断的逻辑可能性，并在公开的论证场地上扛住它们。

反驳一：来自“马太效应”与终末核算的神学辩护

这是本文必须正视的最强大的神学反驳。有人可能会说，圣经本身就教导一种“核算”。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关于才干的比喻，主人按照仆人赚取的银两数量来赏赐他们——赚五子的得五城，赚两子的得两城，那把银子埋在地里的则被夺去所有。连耶稣本人也说过：“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不就是在终末审判的层面，为“可核算的果效具有属灵意义”提供了最高背书吗？如果上帝自己在末日要按“产出”来赏赐，那么教会在今世以可核算的事工产出为评价标准，又有什么错呢？

这个反驳必须在终末论层面获得一个精密的回应，而不能仅以“才干比喻中的银子是恩赐而非人原有财产”来打发——因为即使银子是恩赐，主人却的确照着仆人赚取的“可量化果效”来分配赏赐，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叙事事实。

本文的回应引入一个代理变量与真变量的区分。在才干的比喻中，“赚取银两”是一个代理变量：在终极审判者——上帝自己——的全知凝视下，它代理的是仆人“对主人心意的忠诚”这一不可见的真变量。上帝不会被代理变量所欺骗：他知道谁是真的竭尽所能而仅赚了两子的忠诚者，谁是投机取巧却恰好市场回报率高的诡诈者。在末后审判中，上帝对“心”的鉴察是完全的、无误的——代理变量在那时不会被误认为真变量，因为它站在那位能直接阅读真变量的审判者面前。

但问题在于，教会的此世评价体系并不拥有这种全知的感官能力。我们无法直接阅读另一个人的“忠诚”。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代理变量的层面——只能看见事工出席率、受洗数字、小组倍增速度。核算滑移的危险，恰恰不在于教会使用了代理变量（这是此世认知不可豁免的局限），而在于教会的评价体系忘记了自己手里只有代理变量，而开始把代理当作真变量来审判——将事工产出等同于属灵分量，将岗位参与等同于委身深度，将可量化的果效等同于上帝对一个人的悦纳程度。

在此意义上，终末审判恰恰不是对核算滑移的背书，而是对其最彻底的颠覆：它宣告，那位唯一有资格核算的审判者，将要在某日显明，许多在教会此世核算体系中得分极高的人，其内心的真相却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而许多在此世核算体系中得分为零的人——比如那个右面的强盗，比如林姨——却被判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终末审判不是对教会核算体系的延伸，而是对它的终结。在那个日子，所有的代理变量都将被废弃，所有的账本都将被烧尽，唯一留下的，是那位在代理变量中因信而活的、不可见的心。教会若真相信这一点，它就应当在它此世的每一次评价行动中，都带着对那个终极反转让步的敬畏——而不是提前预演一场它没有权限执行的终审判决。

反驳二：来自管理必要性的实践辩护

第二个反驳来自实践层面：本文对核算滑移的批判，是否在事实上否定了一切教会管理的必要性？如果出席率、事工完成量、受洗人数这些指标都因其“可量化”而被怀疑，那么教会的同工遴选、资源分配、牧养策略制定，究竟还能依据什么？这难道不是要将教会推向一种拒绝一切形式理性的、浪漫化的无政府主义吗？

这个反驳的力度在于，它指出了本文可能滑入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批判姿态。本文必须在此做出一个清晰的划线。第一，本文不反对教会在管理层面使用可量化的指标。一间千人教会需要知道主日出席人数以便安排座位和圣餐分量，这是管理的必要，不是罪。第二，本文也不反对教会在公开场合感谢那些在可识别岗位上忠心服事的肢体。保罗自己也在书信末尾多次提名感谢同工。感谢本身不是罪。

本文反对的，不是“使用可量化的指标”，而是“将可量化指标作为评价一个人委身程度与属灵分量的默认语法，以至于丧失了识别不可量化之恩典行动的感官能力”。本文反对的，不是“感谢那些在岗位上忠心的人”，而是“因为感谢机制的语法天然偏向可核算的行动，而系统性地、年复一年地将不可核算的承重者从群体的公共感恩叙事中整体性地遗漏”。用一句来概括：核算作为工具，是此世教会不可避免的辅助手段；核算作为认知默认，就是滑移。

反驳三：来自“属灵精英主义”的质疑

第三个反驳来自另一个方向：本文是否在反向上制造了一种新的属灵等级——将那些“沉默的、不可见的承重者”拔高为比“在岗位上忠心服事的人”更属灵、更靠近十字架的一群？林姨与招待团队小李的区别，会不会只是一个“恩赐不同”的问题，而非一个“是否被核算逻辑不公义对待”的问题？更尖锐地说，本文对林姨和陈弟兄夫妇的深情描摹，是否在无意中暗示：他们的那条路，是比那些“排班表上的同工”更优越的、更纯粹的跟随基督之路？

这是一个本文必须诚实面对的危险。本文不打算、也绝不能暗示：不可核算的承重比可核算的服事“更属灵”。十字架审判一切——它审判那个因自己能上台讲道而暗自轻看林姨的人，也审判那个以自己的“沉默受苦”为资本而暗中轻看那些“忙忙碌碌的马大”的人。恩典之所以是恩典，恰恰在于

它拒绝被任何人——无论是善于核算的领袖，还是善于沉默的承重者——拿来作为自我称义的资本。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反转属灵等级，将“不可见者”推上新的王座。本文的目的，是揭露那个制造等级的评价语法本身是单向的、失敏的，并追问：我们能不能在群体的公共认知中，为那些无法被这套语法读取的恩典行动，预留一个不要求它们“翻译”成可核算语言的、被严肃对待的位置？这不是要制造新的精英，是要拆毁那个让任何一群人都能成为“精英”的核算量表。

八、结论：在没有解方的张力中，建立对抗性的仪式

至此，本文的论证已全部展开。现在是回到开头那场矛盾的时候了。

恩典的不可核算性，与教会作为组织的可核算性需求，这一矛盾是无法被彻底消解的。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管理模式、一套精妙的神学论述，或一次深刻的属灵复兴能够使它消失。因为它的根，扎在教会作为“既是被圣灵内住的基督身体、又是活在今世由罪人组成的属世组织”这一双重身份的最深处。只要教会仍在历史中，仍在肉身中，这一矛盾就会持续发生，而“核算滑移”就永远是一个不可被完全豁免的威胁。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无策。恰恰是因为这一矛盾无法被根除，教会才被呼召去做一件比“根除”更诚实、也更艰难的事：有意识地、制度性地、反复地建立一系列对抗性的实践，以在每一次核算滑移发生之后，将群体的认知锚点重新拉回恩典这一极。这种实践，本文借用礼仪神学中的一个术语，称之为“对抗性仪式”。

对抗性仪式的核心逻辑，不是要废除核算（那既不可能，也未必可取），而是要在核算逻辑天然占据主导的制度空间中，为恩典逻辑刻意制造一个有形的、被公共承认的发言位置。它不靠消灭敌人来取胜，而靠确保敌人永远有一个公开的、有分量的对手。以下试以本文田野观察中一间教会的尝试为例，勾勒对抗性仪式的可能性形态，并随后指出其自身的脆弱性。

某间教会自2018年起，在年终同工嘉许会中增设了一个环节，名为“非你手所建的殿”。该环节的规则是不允许提名任何有正式岗位的同工，而只能提名那些“你可能从未在教会活动中注意过他们，但他们却以某种方式承托过你或他人的生命”的人。提名人需要在全会众面前，用不超过三分钟的时间，讲述一个具体的、个人的经历——不是总结那个人的“服事果效”，而是描述那个人的存在如何在某个具体时刻，成为了一件“不可被任何事工项目替代的恩典”。被提名者不获得奖状，不获得奖金，不获得一个可以被写进履历的“荣誉”。他们只是被邀请站起来，接受全体会众一段持续三十秒的静默——不是掌声，是静默。

这个仪式的力量，不在它改变了教会的任何制度条款。它的力量在于，它在那个以可核算之业绩为主要语法的嘉许会中，硬生生地切开了一个不可通约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恩典的逻辑——不可量化、不求果效、白白给予——不是被“讲解”出来，而是被一个具体的名字、一段具体的记忆，

肉身化在群体的公共视听之中。仪式化，创造出一种“群体性的器官”，在年年此刻重新激活因滑移而萎缩的认知神经。

但必须立即指出这一仪式的致命脆弱。当“非你手所建的殿”连续举办数年之后，一种微妙的、但可以感知的变化开始浮现：有一些会众开始“期待”自己被提名；有一些小组长在私下交流中，半开玩笑地比较“今年我们小组有几个人被‘静默’了”；甚至有个别被提名者，在被静默完之后，私下向牧者表达了隐晦的失落：“为什么只有静默？就不能有份小礼物吗？”对抗性仪式，刚刚从核算逻辑手中夺回一寸土地，核算逻辑就悄悄地在这寸新土地上撒下了它的种子——将“被静默”本身，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可欲的、可比较的、可核算的“属灵资本”。

这并非失败。这恰恰是本文在全文开头所诊断的那场矛盾的再次显形。对抗性仪式的目标，从来不是一劳永逸地战胜核算逻辑（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在每一次它被重新俘获的时刻，识别出这一俘获，并再次建立新的、尚未被俘获的对抗形式。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在动态中维持张力的实践。它不提供“解方”，它只提供一种持续校正的可能性——让恩典逻辑在教会的公共意识中，永远不会因为太久没有发言权而被彻底遗忘。

因此，本文的结论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一个判断：核算滑移是教会在建制运作中不可避免会反复发生的认知位移，它是恩典与组织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必然产物。教会若幻想可以根除它，就已落入了靠行为称义的陷阱；教会若放任它而毫无抵抗，就已在沉默中背叛了恩典。在这幻想与放任之间，那一条狭窄的、动态的、永远不可松懈的路，就是有意识地、反复地在制度中为恩典逻辑开辟对抗性的空间，并在每一次对抗性空间被核算逻辑重新占领时，绝不灰心地、再次争战。

这条路没有终点。但在那条路的每一个转角处，都有足够的恩典——那不可核算的、不要求对等回报的、为背叛它的人而死的恩典——在等着那些愿意承认自己已深陷滑移、却仍在挣扎中仰望十字架的人。

证伪条件：本文的核心判断——核算滑移是教会在建制运作中不可避免的认知位移——将在以下条件下被证伪：如果在那些有意识地、以非工具化的方式去“看见”和“承接”不可核算之生命承重的教会中，这些恩典行动在被如此对待之后，反而系统性地、可重复地因被“尊荣化”或“标签化”而消散或变质——不是一两间教会的偶然波动，而是在多间认真实践的教会中呈现出稳定的、负面的方向性——则本文的核心判断即告失效。

参考文献

-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Greenleaf, Robert K. *The Servant as Leader*. Indianapolis: Robert K. Greenleaf Center, 1970. Revised and republished in *Servant Leadership: A Journey into the Nature of Legitimate Power and Greatness*.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7.

McGavran, Donald A. *The Bridges of God: A Study in the Strategy of Missions*.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 1955.

Wagner, C. Peter. *Your Church Can Grow: Seven Vital Signs of a Healthy Church*. Glendale: Regal Books, 1976.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Translated by Ephraim Fischhoff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London: Routledge, 1992. (First German publication 1904–1905;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1930.)

Yoder, John Howard. *The Politics of Jesu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2.